

南海“丝绸之路”考古发现浅析

朱非素

烟波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海面时而蔚蓝平静，时而波涛汹涌，引起人类无穷的遐想。早在四五千年前，百越人的祖先，为了探究大海的奥秘，就已凿木为舟，渡海到沿岸附近岛屿活动。

秦汉时期是开发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汉代的广州“亦其一都会也”。不少海船从广州进出，以广州汉墓出土西亚、罗马的舶来品为证。由于海上“丝路”开通，广州成了世界东方大港。汉代至清代两千多年岁月里，经过了无数次王朝更迭，广州始终是外贸的重要港口。唐代在广州设市舶使，宋代设市舶司，到了清代在广州设“十三行”等外贸机构和商行。

佛教最早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南朝时不少外国佛教名僧乘商船沿着南海“丝路”到中国弘扬佛法。

唐代开始，陶瓷器成了外贸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珠江口外西侧航线是中外商船必经之路，上川岛附近海域捞获大量宋代瓷器，应是沉船上装载的货物。笔者就上述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

广东濒临南海，海岸曲折多良港，附近有岛屿，早在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在南海之滨的百越人祖先，已知舟楫之利，渡海到附近岛屿居住或进行季节性的生产活动。近年来考古学者在离大陆0.5-4.5海里的岛屿，如万山群岛东澳岛南沙湾；淇澳岛后沙湾、东澳湾、婆湾；三灶岛草堂湾；南水高栏岛^[1]和香港南丫岛深湾^[2]及大屿山东湾^[3]均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古遗址。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很有特色，多数位于伸进陆地呈弧形状的海湾沙丘和沙堤上，高出海平面4-9米，湾内浪静风弱，背后和两侧有低山做屏障，一条发源于远山或低岗的淡水河，流经遗址附近注入海中。是古代居民有意选择的栖息地，东澳湾遗址第三层下遗留有当时人群到岛上活动，炊煮食物时用过的灶和灶坑^[4]。上述众多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不同时期的夹砂陶釜、陶支座、彩陶盘、彩陶豆和石铤、石斧、石网坠及稍晚时期的铜斧石范、陶范、鱼钩石范、夔纹（双F纹）陶罐、原始瓷豆；米字纹、方格交叉纹陶罐、水波纹陶罐等。在雷州湾北部碓洲岛上还发现战国墓，出土铜鼎、铜剑等。

春秋战国时期到附近岛屿活动的古代居民，在海湾石壁上凿刻岩画。其中最著名的为珠海市南水高栏岛宝镜湾岩画，画面上画刻出人和动物形态，还有船头、船尾上翘的海船。先秦时期，在海滨和岛屿活动、生活的越人，实际上是开发海上航路的先驱，他们的后人很可能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一批开拓者。

二

秦汉时期是开发海上“丝绸之路”并将航海向远洋发展的时代。《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史籍记载了西汉政府派出由译使率领的船队，到达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这条航线首先应是海上民间贸易商人开辟的。

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中国丝绸已成为地中海世界最珍贵的衣料，其中部分衣料，从海上“丝路”到达地中海东岸。当然，秦汉时的航线尚未直达波斯湾，《汉书·地理志》载，还需“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而外国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琉璃器（玻璃器）等货物亦从海路运抵中国。《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罗马帝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无疑，上述部分物产也通过海上“丝路”与中国进行贸易。古文献没有记载汉代与罗马帝国之间贸易情形，而后期的《魏略·西戎传》曾记载了罗马和伊间之间的贸易。大秦国“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绌，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实际上两国在海上进行的中国丝绸贸易，可能早在汉代已经开始了。

最近考古学者在广东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仕尾村发现大范围的汉代遗址，并在仕尾村头塌落的汉代瓦砾堆积中采集到一件有文字的“万岁”瓦当，直径14.5厘米，红褐陶，“万岁”二字为篆书，配以对称的云纹。二桥、仕尾村内均有绳纹板瓦、筒瓦、陶罐残片堆积。绳纹板瓦可分两类，一类板瓦背面是凸圆点纹，另一类背面是布纹。初步分析，二桥、仕尾村汉代遗址上限为西汉，下限到东汉，遗址面临琼州海峡，推测此处可能是古徐闻港所在地。^[5]

《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广州）亦其一都会也，珠玕、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代的广州已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外贸都会之一。不少考古新发现说明，早在西汉时广州已有西方罗马帝国和西亚的舶来品，他们是中西海上贸易的证物，西汉前期商南越王赵昧墓出土的一件银盒^[6]，通高12.1厘米，腹径14.8厘米。盖身相合如扁球形，盖腹均锤揲密排突瓣纹，口沿有穗状带状，纹的表面鎏金极薄。银盒的造型和纹饰都区别于中国汉代同类器物的特征，而与伊朗古苏撒城（今舒什特尔）出土的银盒相类似，是目前广州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舶来品。而广州横枝岗西汉中期墓（M2061）出土的三件玻璃碗^[7]，是目前在中国出土较早的罗马玻璃器皿。玻璃碗均呈深蓝紫色，模制成型，外壁及口沿经过打磨。有关专家认为这种风格很像地中海南岸的罗马玻璃中心公元前1世纪的产品。经定性分析是钠钙玻璃^[8]。广东汉墓中出土不少装饰品串珠，用琉璃、玛瑙、琥珀、水晶等制成，其中少部分的叠嵌眼圈式玻璃珠和药物蚀花肉红石髓珠，均为南海输入的舶来品。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遗物，如西汉初南越王墓西耳室中部出土的青铜印花凸板。

印花凸板正面为凸起火焰状图案线纹，阴纹低凹，有使用过的磨损痕迹，背面有钮穿孔，是两件用于丝绸戳印的工具^[9]，出土时其两侧有大量丝织品。还有两汉墓出土的铜熏炉和陶熏炉近二百件之多，造型十分独特，有青铜四连体熏炉，有单体豆式熏炉，有灯式熏炉，炉盖均镂空，是当时居室里燃熏香料的器具，而香料源自海上贸易。另外随葬品中的陶俑灯座别具特色，陶俑为深目高鼻或头型较短，宽鼻厚唇，裸体，跏坐或箕踞而坐头顶灯盘，也有单腿下跪一手托灯盘，这些陶俑的特征同西亚和南洋群岛的人相似，反映了当时有少数西亚和南洋群岛人，曾被商船贩运到广州后，沦为富人家奴的形象。^[10]

到了汉代，中国造船业有了发展，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广东汉墓中曾出土陶船、木船模型十几件之多，这肯定同江河和海上交通发达有直接关系，在船模型上已仿造出较完备的设施。如广州西村皇帝岗1号墓出土的西汉中期木船模型，长80.4厘米，中部有两舱。另一件东汉晚期墓出土的陶船，长54厘米，宽11.5厘米，前窄后宽，有八根横梁支撑伸出舷外的甲板，中部两舱，尾部有舵楼，两舷设撑篙的走道，船艏每舷立三根桨架。船艏系碇，船尾设舵，舱内及走道有十多个陶俑，是一艘可做客货混载的内河航船模型^[11]。而德庆县高良镇官村发现一座东汉墓，出土一件适宜海上航行的海船模型最为生动，其船艏、船尾翘起，以甲板为界，下为底舱，上为楼舱，前后各有一块活动板与之相通。船尾有舵舱，设高而大的尾舵，利于海上航行^[12]。

三

公元4世纪初，西晋末年的中原地区，战乱不止，经济凋敝，唯岭南地区时局稳定。晋墓砖上有“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这类吉语，反映出当时广州地区的社会现实。政局稳定促使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开通，增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主要先从陆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天竺之间已有海道相通，不少中外佛教僧人，乘商船到达广州或从广州出发浮海西去。东晋僧人法显著《佛国记》，记录了沿陆上“丝路”到印度取经，后取道海上“丝路”回国的经历。法显乘商人大船到耶婆提国（印尼），曾停留居住了五个月，而后乘另一艘商船回国。《佛国记》载：“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法显于船上安居，东北行趋广州。”说明了该商船原计划五十天后在广州靠岸，后因“遇黑风暴雨”在青州长广郡界（山东牢山）上岸。法显在《佛国记》一书里所描述的商船，船体之大可载二百多人和五十天的给养，同时也记录了耶婆提国到广州的航线是商船经常往来的海路。

南朝时天竺国三藏法师求那跋陀罗：“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泛海，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另一名是中国佛教四大译师之一的天竺名僧真谛(499-569)^[13]，梁中大同元年(546)经扶南（柬埔寨）到达广州后到建业。天嘉三年(562)：“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行，欲还天竺。乃因风于十二月中旬飘抵广州。”^[14]这段记载说明了从长江口出发经南海到印度的

海路是畅通的，因遇飓风，船飘到广州上岸。真谛无法从海路西归，后为广州刺史欧阳颙所挽留，延住广州制旨寺（今光孝寺）翻译佛经。南朝名僧慧恺在真谛译《摄大乘论序》里写到真谛翻译《摄论》时情形：“（真谛）于广州制旨寺便就翻译。……恺谨受笔，随出随书，一章一句，备尽研核，释义若竟。文乃著文。”^[15]指出真谛译经活动场所主要在制旨寺。1990年春，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发掘光孝寺明代钟楼、鼓楼遗址时，在探方第③层，出土了南朝建筑上的莲花纹瓦当，直径15厘米，八瓣莲花纹，中央为凸莲心纹。同层出土的还有体形修长的青釉鸡首壶，四耳罐和数量较多的大小青釉碗、杯等日用器皿。进一步从实物证明，南朝时的广州制旨寺，不但是中外名僧建道场弘扬佛法的寺庙，还是岭南著名的译经场。经罗香林先生考证：“六朝至唐梵僧在光孝寺所译各经可为考释者，有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真谛、般刺密帝等，共译经论二十部，陈朝真谛所译十六部。真谛所传摄论与俱舍等宗，到隋代，传到建业和长安，唐初时盛极一时。”^[16]

当时广州是岭南政治经济中心，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第一大港。晋殷巨在《奇布赋及序》中写道：“惟泰（太）康二年（281），安南将军广州牧滕侯作镇南方，余时承乏，添备下潦。俄而大秦国奉献琛，来经广州，众宝既丽，火布由奇。”^[17]生动地叙述了当时罗马帝国使者沿海道到中国从广州上岸的情形。《晋书·吴隐之传》记：“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筐之宝，可资数世。”^[18]《南齐书·东南夷传》记：“……四方珍怪，莫此为先巧，藏山隐海，环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物积王府。”^[19]广州对外贸易发达，可见一斑。当时中国丝绸仍是出口的主要商品。

这时期海上“丝路”的物证，有西沙群岛的考古发现和遂溪县城郊边湾村窖藏出土了一批波斯银币和金银器。西沙群岛的考古发现又以北礁礁盘上的发现较为重要。南海海面星罗棋布的珊瑚岛镶嵌在大海上，北礁位于群岛最西北险要地段，历代有沉船在此触礁沉没，礁盘上留下南朝至明清的遗物，其中以陶瓷器为大宗。1975年考古学者在礁盘上捞获到南朝青釉六耳罐和青釉小杯，这类罐和杯在广东南朝墓中常见。1984年在遂溪县城郊边湾村村后空地，距表土15厘米深处出土肩腹各有四耳、器表饰水波纹陶瓮，此类陶瓷见于遂溪县境内南朝瓮棺墓葬。陶瓮内储藏金银器和波斯银币^[20]，金银器有金指环6件，金环2件，小银环60件，重量720克，镌十字花连环纹六圈的银镯1件，重量295克，素面银镯12件，重量1740克，银盒1件，还有银簪和鍍金器2件，金碗1件。其中鍍金尖底器为广东境内首次发现，器为里外鍍金，敛口、圆形、尖底，用途待考。器表镌花纹，锤打成型，花纹纤细繁缛，以蔓藤忍冬纹、莲花形、花草纹为衬底，再镌刻鱼、鸟，尖底部分为瘦体莲花瓣纹。银盒已残，仍能观察到盒的形制为子口平底，带盖，器身一周蔓藤忍冬纹，盒里和外壁底部镌刻不同造型的莲花纹。银碗口沿为十二花瓣形，斜圈足，口沿外周刻有波斯文。与这批金银器共出的一件金碗，口微敛，弧壁深腹，矮圈足，素面，锤打成型。其形制与广东南朝的青釉杯、碗相同，见于始兴县城郊赤土岭11号墓Ⅰ式青瓷

杯，为南朝晚期墓随葬品^[21]。大而重的银镯，表面光滑。截面为“C”小银环，可能是衣物上饰物。上述金银器，在广东省境内为首次发现。广东出土的波斯银币近三十枚，是我国东南沿海省区出土波斯银币最多的省份，有力地说明在海上中西文化交流中广东所处的重要地位。波斯银币集中粤北和雷州半岛出土，英德县浚洗南齐建武四年(497)墓中出土了三枚萨珊朝卑路斯银币^[22]。曲江县南华寺3号南朝墓出土波斯银币碎片九片^[23]。遂溪县边湾村窖藏出土波斯银币二十余枚，其铸造年代大约在沙卜尔三世至卑路斯之间(383-484)。银币上多数有穿孔，可能是用于佩带和缝缀在衣帽上的饰物，足见银币之珍贵。边湾村出土的金银器，除一件金碗之外，从器物的造型和花纹特点分析，既不同北朝墓出土的金银器，也区别于后期唐代金银器，笔者认为很大可能是一批西亚金银器，是从海道运来中国的舶来品，是中国南方从广州起航通向波斯湾的实物例证。

四

唐、宋、元是南海“丝绸之路”发展时期。唐代的中国是世界东方强大的帝国。隋朝统一中国之后，到了唐代，有两百多年的政局稳定时期，促进了经济繁荣，是中西文化、经济交流在海上、陆上“丝绸之路”来往最频繁时期，因此也是史官留笔较详尽，记载海外贸易资料较多的朝代。

由于海上中西贸易发达，广州成了东方贸易大港。唐朝李延寿撰《南史》记录六朝事，卷七十八：“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并记狼牙愴国“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李氏撰写《南史》时，熟知到达海南诸国的航路，可见这条航线从南朝至唐代均有商舶航行。后晋刘昫编的《旧唐书》卷八十九：“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唐代初年约7世纪初至中叶，外贸事宜由广州刺史之佐官长史负责。《唐会要》卷六十六记载：“显庆六年(661)二月十六日敕，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朝廷规定舶来品中除部分商品上交少府监外，其他商品允许在市场上交易，足见唐王朝立国不久就很重视海外贸易。由于外贸的发展，8世纪初在广州设市舶使。据《册府元龟》卷五百四十六载：“柳泽开元二年(714)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与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唐代李肇撰《唐国史补》中也记载了南海舶和市舶使之事。“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狱者”。李肇在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外国大海船上满载宝货驶抵广州，全城喧闹起来。由岭南道府外贸官员市舶使造册登记舶货和“纳舶脚”即海舶需纳下碇费等事。市舶使是广州刺史属下的一名外贸官员。《旧唐书》一百七十七卷记卢钧任广州刺

史事：“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钩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这条史料说明刺史属下监军领市舶使，另一方面指出任广州刺史是当时官僚机构的肥缺。尤其是唐代天宝之后，官僚贪赃枉法，政府腐败，从广州外贸中得利肥私。1956年12月陕西省西安出土窖藏银铤一件^[24]，银铤为铸造成型，正面中间篆刻“岭南采访使兼南海郡太守臣彭杲进”，右上角篆刻“银五十两”。彭杲即彭果，史书有记载，《旧唐书》卷九十八卢奐传载：“（卢奐）天宝初，为晋陵太守，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瑰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守、五府节度，皆坐赃钜万而死，乃特授奐为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贪吏敛迹，人用安之。”彭杲任南海太守时，贪污了数目极大的钱财，其来源多取自诸海舶之利，他除私自独贪和上交法定赋税、常贡之外，这件银铤是件向皇帝额外进贡的银铤^[25]。另外于1977年4月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市潘家村南小巷工地出土两件银铤，均铸造成型，表面锤击光亮，长26.4厘米，宽6.7厘米，厚1.1厘米，重2107克，另一件重2115克。正面中间篆刻“岭南道税商银伍拾两官秤”十一字，侧篆刻“匠黄泰”。笔者认为这两铤税商银与外贸商税有关，是“阅商人财货”所得税，变造成银铤上送长安国库的实物。这里所指的“商人”，主要是海舶商人和从事外贸的商人。当时广州外贸及同外贸商业有关的所得税与当年的两税所得等同。《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王锷传》载：“贞元三年(787)，（锷）迁广州刺史……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业求于川市。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还是这王锷，“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连京师的权贵们都从王锷那里得到舶来品。唐宝历二年(826)，胡证任广州刺史，《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载：“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当时胡证在京城修行里建宅第，连绵闾巷，岭表奇货源源不断北运京城。到了大和二年(828)，胡证“上表求还京师”，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京邑推家富家”。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在中西交通和贸易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当时海外贸易之发达。

唐代，中国瓷器沿着广州至波斯湾的航线源源输出，船舶所经海域附近岛屿、珊瑚礁、海底及沿岸港口均有唐瓷出土。西沙群岛北礁礁盘上出土唐代青釉盘、碗、四系罐等，均为广东高明县大岗山唐窑产品，其中有双耳罐为福建唐窑产品。精彩的是出土一件长沙铜官窑贴花人物壶，器身布满了珊瑚礁上的凝结物^[26]。同时珠江口外伶仃岛附近海域，于1977年当时还是珠海县的渔民在海上作业时，打捞到十四件瓷器。稍后于1984年在荷包岛以南海域打捞到二十一件瓷器^[27]，器类有四耳青釉大罐，而青釉碗则相叠置于大罐中，两批瓷器形制特点基本相同，陶器青灰色厚胎，青绿釉施得不均匀、不彻底。罐作敞口，深鼓腹，平底。碗作敞口弧壁，圆饼形实足，内底有五块长条形垫烧痕迹，与广东新会官冲窑、高明大岗山唐代窑产品相同，因经海水长期浸泡，陶器表里均有一层海底凝结物。应是两批本地外销瓷器，因风暴或其他原因沉入海底。同时国外发现唐瓷的地点，多数是

广州至波斯湾航线沿岸地区。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28]中详细地分析了东南亚、南亚、波斯湾和北非沿岸港口遗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唐瓷，其中以唐三彩、唐越窑和长沙窑产品较多见。广东新会官冲窑、高明大岗山窑、梅县水车窑等唐窑产品也在东南亚国家发现^[29]。从唐代始，瓷器已是外贸的主要商品之一。

7世纪下半叶，随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广州经商，伊斯兰教首先由海道传入中国，在教徒聚居地，兴建礼拜寺，广州光塔可能是当时所建，光塔附近街巷住着来中国经商的番商、番客，并设有番长一职。成书于唐昭宗时(889-900)的刘恂《岭表录异》载：“恂曾于番酋家食本国将来者(波斯枣)，色类砂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当时扬州、泉州港均有大批番客。唐大和八年(834)文宗曾颁诏令重申唐王朝对外贸易政策。《全唐文》卷七十五诏令：“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使、观客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海南岛也曾有阿拉伯人留住，考古学者于1978年及以后几年，在海南省三亚市酸梅角、番岭坡和陵水县干教坡、土福湾等地，发现了七十多座伊斯兰教徒墓^[30]。据居住在酸梅角的居民反映，原来当地的“番人墓”有数百座之多，已遭后期破坏。这批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无葬具也不见随葬品，死者为侧身屈肢葬，头向西北，面朝西，脚东南。每座墓的前后两端各竖石碑一块，均用珊瑚石雕刻而成，有碑文和图案的一面朝外，碑文、花纹和碑形稍有区别。碑文全部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上刻《古兰经》文句，“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这个坟墓仅是他最终的归宿”“万物非主，唯有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凡人必有一死，唯有至尊至大的真主永存”。墓碑上的花纹图案有圆月、浮云、花朵、“生命树”。墓葬年代的上限为唐代，下限至元代。这批墓葬的发现，证明了唐、宋、元时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曾在这一带地方活动过。无论是暂居、定居或假泊，都与海上贸易有关，墓地均位于海舶来往必经之地的濒海沙滩上。

进入10世纪至12世纪的宋代，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中国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有了新发展，开创了航运史的新局面。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广舶条记：“浮南海而去，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宋代朱或《萍洲可谈》记：“海舶大善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国内有部分人将钱托纲首，购买外国货物，被朝廷下令禁止。《宋史·食货志》载：“(乾道)七年(1171)诏见任官，以钱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者罚。广舶商人首脑称谓“纲首”，“纲首”一说，已有物为证，1964年曲江县南华寺发现的北宋木雕罗汉像，其中七尊像底座刻有“纲首”的铭文^[31]，编号024底座阴刻：“广州纲首樊密同母曹八娘，舍尊者南华寺供养，保安吉。”编号066底座阴刻“广州纲首陈德安，收赎尊者，奉为先妣梁十五娘早生天界。丁亥二月日题”。说明了身为海舶头领的“纲首”，因从事海外贸易，不但富有且社会地位甚高，所以铭文中自称“纲首”某某。罗汉像底座铭中标明本人籍贯的，广州

98人、连州17人、浙江衢州（衢县）3人、福建泉州15人、潮州3人，其中广州、泉州、衢州、潮州等地均是商业发达的港口城市，这些用进口檀香木雕刻的罗汉像，其一反映对外贸易发达，其二罗汉像捐造本身，是同外贸有关的商人，除纲首外，可能还有副纲首、杂事等。

宋王朝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宋史·食货志》卷一百八十六：“（宋开宝）四年（971）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州、明州置司。”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即负责外贸事务。《宋史》卷四百四十六苏缄传记载：“（苏缄）举进士，调广州南海主簿。州领蕃舶，每商至，则择官阅实其货……”《岭南代答》卷三载：“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国家绥怀外夷，於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难之欲赴诉者必提举司也。”很显然，与唐代相比，宋代提举市舶司是独立外贸机构，其职能更健全。反映广州港海外贸易繁忙场景的，广州南海神庙现存一通南宋乾道元年刻《南海广和洪圣胎顺咸显王记》碑文中有“（广州）夷舶往来，百货丰盈”的记载。随着海外贸易发达，为数不少的外国商人留居或暂居广州、泉州、潮州等沿海城市。《萍洲可谈》记：“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当时广州除有蕃坊之外，还设置培养外商子弟的“蕃学”。在广州市光塔街附近还有一条南北向小巷，名为玛瑙巷，沿用至今。

从目前考古发现分析，瓷器外销数量超过前期，在航线经过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和波斯湾、东非、北非等沿岸港口均见宋瓷^[32]。因大宋瓷器输出，促进广东瓷器业的发展，便有了广东潮州笔架山北宋窑群^[33]和广州西村宋窑^[34]的兴起和产品输出，且不少瓷器曾在东南亚国家出土^[35]。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证：“船舶深阔各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千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生动地描述了广舶运载陶瓷出口的情景。

1975年西沙群岛考古调查时，在北礁礁盘上发现了大量宋瓷，达五百多件，瓷器窑口有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和福建各地窑场^[36]。1979年海南省陵水县移辇村等地海滩发现晚唐和宋代瓷器。埋在沙丘中的唐代青釉碗，发现时是十件碗一捆放置^[37]。在里陵村山坡出土两个大缸，内置二百多件宋代瓷器。本号镇军普三十笠村南面土墩，在距表土1米多深土中，出土一件高约80厘米青釉带盖大瓮，内藏一百多件宋代瓷碗和瓷碟^[38]。上述出土瓷器地点均位于海南省东海岸，是航船必经之地，几批瓷器可能是商船上的货物。1987年在台山县南面海域，打捞到沉船中大批南宋瓷器和船上日用品锡壶、鍍金腰带及银锭等，瓷器多数为福建窑场产品，有青白釉瓷碗、酱釉扁身瓷瓶、白釉瓷盒、青釉瓷碗。泉州磁灶窑的绿釉印花小瓷盘和绿釉长颈瓷瓶。德化碗坪仑窑的白釉小瓷瓶。少数是浙江龙泉窑产品，有青釉双鱼洗、青釉瓷壶、罐、划花瓷碗等^[39]。在一些白釉瓷盒、瓷碗和酱釉身瓷瓶底部墨书“蔡”“陈”“林”“郑知客”“然”“杨十”

等字，应为该艘南宋海船上商人的记号，因为船上的“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为被免各自的货物相混，特意在瓷器底部墨书记号。从瓷器的窑口分析，这是一艘从福建泉州港起航，沉没在上川岛附近海域的商船。泉州为宋元时期对外贸易大港，如若商船从泉州港出发到三佛齐（印尼巨港附近）、婆（爪哇）、渤泥、麻逸等地或从泉州放洋到波斯湾均需经南海海域和广东沿岸^[40]，所以发现了沉船遗物。

元承宋制重视商业活动。元世祖曾宣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至元十四年（1277）以后，相继设立了泉州、温州、杭州、广州等地市舶司，颁布了市舶则法，明文规定：“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为之。”至元二十一年（1284），官商海船加入外贸船队。《元史·食货志》记：“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所得其三。”官商船队的崛起，促进了外贸的繁荣发达。当时的广州仍是中国主要外贸港口之一。元人陈大震撰《大德南海志》卷七载：“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外商纷至沓来，广州为一繁华都市，进口商品与前代差不多，传统舶来品中的珍宝、香药等专供皇室、贵族享用。出口商品以丝绸、瓷器为主。从广州出发的海舶，走西南向，珠江口外西侧航线，经过横琴岛、三灶岛、高栏岛、上下川岛附近海域，而后向海南岛、西沙群岛海域进发。1969年4月珠海县（后改市）南水公社渔业大队民兵在蚊洲岛沙滩冲积层中发现瓷器。蚊洲岛为珠江口西南一小岛，仅七万平方米，西望高栏岛，四面临海，瓷器埋在岛北面沙滩，距表土40厘米下的沙层中，出土时瓷碟、瓷碗分别层叠侧置，排列成六行，附近有包装瓷器用但已腐朽的草木灰痕迹，共计瓷器二百一十二件，胎质厚重，有青中泛灰色和青中泛黄的青釉，内壁或内底模印折枝花或花瓣纹，应是元代浙江龙泉窑系产品^[41]。西沙群岛北礁亦发现元代瓷器一百三十件之多，有福建窑场产品青釉瓷盘和碗，碗内沿和底划弦纹圈和底心印“吉”字的碗。其次是浙江龙泉窑产品^[42]，有底心模印微凸菊花纹的青釉瓷盘及碗、瓜棱形执壶、瓶、双耳罐等，还有一件元代青花八角形小盖罐。上述海岛所获的瓷器，绝大多数是沉船上的遗物。元代海舶航行到波斯湾，还继续向南驶向阿拉伯半岛。

五

明代初年，明太祖曾实行“海禁”，有过“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后来许可贡舶附货物进行贸易。《明史·食货五》载：“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又载：“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洪武初，在宁波、泉州、广州设市舶司置提举官。明初贡舶贸易盛行一时，永乐三年（1405）“以诸蕃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1964年在广州市东山发现了明代太监韦眷墓。韦眷曾任广东提举市舶太监，明史有传，记在任时，“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富”。他比较重视民间贸易。死后墓中随

葬三枚银币，穆葛刺国（孟加拉国）银币两枚，威尼斯国银币一枚，铸于1459年至1462年之间^[43]。

明代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近三万舟量，六十余艘宝船，先后七下西洋，遍历亚、非三十余国。1975年在西沙群岛北礁礁盘上发现明代初年沉船上的铜锭二十四块，铜钱四百多公斤，其中明代“永乐通宝”钱数量最多，穿成串胶结在礁盘上，无流通使用过的痕迹。根据遗物和遗物散布的情况推测，很可能是郑和率领下西洋的宝船之一，经西沙群岛航道时，触礁沉没^[44]。1978年在广州市铁局巷出土一件明代四爪大铁锚，通高3.4米，形状同明代宋应星撰《天工开物》一书中“锤锚图”插图中的铁锚十分相似，应是大海船上的铁锚，从而反映出海上贸易的盛况和明代造船技术的高度发展。

从洪武初年恢复市舶司的近百年里，海外贸易往来还属正常。到了明代嘉靖二年（1523）“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从此，大规模海上贸易和远洋航行逐步走下坡路，当然民间海外贸易并没有因“罢市舶”而终止。考古学者在西沙群岛礁盘上发现了大量明代嘉靖年间青花瓷器，均来自江西各地民窑、福建德化窑。而福建、广东海边和岛屿常见到的宋、明、清时期建的天妃宫、天后宫、妈祖庙，就是渔民和商船上人们心中的保护神，同民间海外贸易有密切的关系。明代晚期，列强东来和政府的“海禁”直接限制了海外贸易。1990年湛江市硃洲岛渔民在上川岛海域20米深处海底，打捞起三门铜炮^[45]海底，是列强东来的物证之一。

清初，由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前，福建、广东以及江浙海抗清政权的存在，顺治至康熙初年实行严厉的海禁。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二十四年（1685）成立粤海关。《清朝通志》卷九十三载：“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这时期大量陶瓷输出，主要通过民间贸易，且以输出民用粗瓷为大宗。西沙群岛北礁礁盘上发现的清代早期至晚期青花瓷器证明了这一点，同珊瑚凝结在一起的青花瓷盘、碗、杯、匙等，除少量为江西景德镇民窑外，其他都是福建、广东东部窑场产品，还有少量广东石湾窑和广西钦县紫砂陶器^[46]。价廉物美的青花粗瓷成了畅销到外国的商品。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出土了广东大埔、饶平等地窑口的清代青花瓷器^[47]。

清代外销瓷中有相当部分瓷器式样、花纹是根据欧洲市场所需而制作的。《景德镇陶录》载：“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者、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广彩就在“欧土重华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清人刘子芬撰《竹园陶说》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广州加工广彩的工场，竟多达一百多间，该书记载：“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博物馆的广彩瓷碟、碗、瓶、方罐等，花纹繁缛，色彩华丽，主纹有西洋仕女和楼房。^[48]

清初成立的粤海关有总口七处，其中一处总口在潮州巷埠。现存潮州市博物馆的一通“巷埠海关地界”碑，原立于潮州市巷埠万和桥一侧连杉街，高90厘米，宽30厘米。清政府既要对外通商，又要防止外商与中国人直接往来进行贸易活动，在广州一口，便由官方指定管理外商贸易业务的牙商，叫“官商”或“洋行”，牙商开设的行店，称为洋货店或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的业务范围，规定经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49]。而外商在广州的贸易办事处称“十三夷馆”或“商馆”。广州市博物馆藏的一件紫檀牙雕“十三行商馆图”插屏和广州“十三行”商馆油画，商馆建在珠江边，门前旗杆上挂着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的国旗。江面上停泊着大小船只，并可见到大型海船，反映了开放海禁后的广州，通商贸易繁华的场景。成书于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广东新语》洋船条记：“洋船之大者日独樯船，能载一千婆兰，一婆兰三百斤，番语也。”即大型洋船可载重三十万斤（清制）。1972年澄海县东里和洲村发现一艘沉船，船体残长28米，船舷板上书“广东省潮州府领 字双 桅壹佰肆拾五号蔡万利商船”等字。这艘船可能是从东里樟林港出发到海外贸易的商船，由于某种原因商船沉没了。1984年湛江市博物馆在市郊征集到一件青铜“缉捕巡船”模型，通高27厘米、长29厘米、宽4-5.5厘米，下为紫檀木雕海浪座^[50]，甲板上排列七门大炮，船头五门，船尾两门，炮位附近有兵丁四人，中部为船舱，左右舷挂虎头纹盾牌和直插着刀叉剑戟等，船尾刻“缉捕巡船”四字。清代的广东内河和沿海，盗贼猖獗，官府对贡舶和商船实行护航，同时负责缉查走私船只，这是一艘政府巡船的模式。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为全国唯一的外贸港口，海运相当繁荣。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的贡舶贸易和民间海外贸易，犹如夕阳下天边的最后一道霞光，逐渐暗淡而走向衰落。

始于两千多年前西汉初期的南海“丝绸之路”，从历代史官的笔下、文人墨客的笔记中和现代考古新发现里，向人们展现了一幕幕史诗般辉煌场景。从中国美丽耀眼的丝绸为发端，引来了西亚、古罗马的玻璃器、金银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精美实用的瓷器顺着这条海上大动脉源源不断向西流去，从而使东西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相互交流而放出异彩，并带来了巨大影响^[51]。

注 释：

[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秦维廉：《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香港出版1978年。

[3] 邓聪、区家发：《香港大屿山东湾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发掘简报》，《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4] 广东省博物馆等：《珠海淇澳岛东澳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5][29][39][44][45][47][48][50]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

- [6] 广州象岗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 [7][10][11]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 [8]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 [9] 吕烈丹：《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印花凸板》，《考古》1989年第2期。
- [12] 杨耀林、谭永业：《广东德庆汉墓出土一件陶船模型》，《文物》1983年10期。
- [13] [晋]法显著：《佛国记》。
- [14]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 [15] 《续僧传》卷一。
- [16] 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香港中国学社1960年版。
- [17] 程洪编著，《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 [18] 《晋书·吴隐之传》卷九十。
- [19] 《南齐书·东南夷传》卷五十。
- [20] 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 [21]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一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二集，1982年版。
- [22] 徐恒彬：《广东英德泮镇南朝隋唐墓发掘》，《考古》1963年第9期。
- [23]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7期。
- [24] 李问渠：《弥足珍贵的天宝遗物》，《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
- [25] 陆九皋、韩伟：《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26][36][42][46]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西沙群岛北礁发现的古代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1982年版。
- [27] 杨少祥：《珠江口发现的唐代外销陶瓷》，《广东文博》1983年第1期（内部刊物）。
- [28][32] 马文宽、孟凡人著：《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
- [30] 李居礼、王克荣：《从陵水三亚发现的穆斯林墓葬看古代穆斯林在海南岛的活动》，《海南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1987年第1期（内部刊物）。
- [31] 广东省博物馆：《南华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 [32] 广东省博物馆：《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 [34] 广州市文管会等：《广州西村窑》，香港出版1987年版。
- [35] 杨少祥：《广东瓷器与国内外瓷窑的关系》，《广东出土五代至清文物》，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37] 何纪生、李居礼：《陵水县移辇村海滩发现唐宋时代陶瓷器》，《文博通讯》第8期（内部刊物）。
- [38] 曾广亿：《广东陵水、顺德、揭西出土宋代瓷器、渔猎工具和元代钞版》，《考古》1930年第1期。
- [39] 福建泉州海外文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
- [41] 曾广亿：《广东珠海、汕头出土的元、明瓷器》，《文物》1974年第10期。
- [42] 广州市文物志编委会：《广州市文物志》，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
- [43] 《简明广东史》第八章第六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51] 人民画报社：《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画报出版公司1989年版。

作者：朱非素，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从事文博工作四十五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选自《“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